

新技术革命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及政策应对

屈小博^{1,2} 张海鹏^{1,2}

(1. 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 100006;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2488)

摘 要:新技术革命带来无限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巨大挑战。本文基于技术革命的历史视角和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分析了新技术革命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就历史经验来看,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经历了四次技术革命,前三次技术革命都没有导致大量失业现象的出现,但是对就业结构和社会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以机器人、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具有更强的技能替代偏向,不仅能够替代常规体力工作,也在替代大量可编程的脑力工作,使经济社会和劳动力市场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进而对我国的就业结构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产生了诸多冲击。为避免不同劳动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对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产生不利影响,应结合新技术革命特征,做出针对性的政策举措。首先,要优化收入分配政策优先序,强化初次分配机制,提升中等收入群体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完善再分配和社会保障体系,向低收入群体适度倾斜,增强其适应技术变革的能力。最后,政府、企业和个人应形成合力,创新政策工具,共同应对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结构性挑战。

关键词:新技术革命;收入分配;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F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25)10-0099-08

DOI:10.13713/j.cnki.cssci.2025.10.001

当前,以机器人、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和人民生活福祉。2025 年 10 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1]技术创新和变革既能显著提高生产率,也会深刻影响收入分配。从这个意义来讲,加强产业体系建设与调节收入分配必须增强政策取向的一致性,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从长远来看,还必须统筹考虑推动技术创新和变革与调节收入差距的关系,采取更加有针对性的举措,确保我国经济行稳致远。

一、工业革命影响收入分配的历史经验

自 18 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生产自动化始终是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之一。150 多年来,每一轮工业革命虽然都没有造成大量失业,但却深刻改变了就业结构,进而对收入分配产生了显著影响。

(一)工业革命深刻改变就业结构

第一次工业革命实现了从手工生产到机器生产的巨变,使工业部门成为英国的主导部门,并将大多数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了工业部门。随着蒸汽机大规模使用,纺织等工业部门的生产率明显提升,农业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不断下降,英国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渐增多。新兴的城市部门在开始时吸收了大多数就业,随着劳动成本上升、机器价格不断下降,城市工业部门吸纳就业的能力开始减弱,这时开始出现失业现象,甚至爆发了打砸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项目“人口与就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问题研究”(2024YZD014)。

作者简介:屈小博,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人口转变、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张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农村发展、城乡关系、林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机器的“卢德工人运动”,但这种集中性的失业现象在整个第一次技术革命中只存在很短时间。

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经济进入繁荣时期,催生出大量就业需求。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美国、英国、德国等国相继发生了以电力大规模应用和内燃机为主要动力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价格更为低廉、输送更为便捷的能源供应导致规模化生产,推动了各国工业化的进程,工业部门在各国经济体系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第二次工业革命实现了从“单件作业”到“流水线作业”的大规模生产方式的转变。以德国为例,仅在 1891—1913 年期间电气工业产值就提升了 28 倍,极大提高了工业部门的生产效率,并且在工业部门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2]。同时,快速发展的自动化进程也带动了交通、金融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催生出许多新的就业机会。

第三次工业革命导致劳动力市场出现“两极化”趋势。自 20 世纪 40 年代起,人类社会开启了第三次工业革命。这次技术革命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原子能和计算机的发明应用为标志,延续至 20 世纪 60、70 年代;第二阶段以信息和通讯技术革命为标志,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纪初,这一阶段以互联网为基础,实现了由“大规模生产”向“自动化生产”的转变。第三次技术革命在深度与广度上都远超前两次,最终使第三产业成为主要发达国家的主导产业。信息技术带来的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导致一些从事重复性工作的劳动者被大量替代,同时也创造了一系列与信息技术具有互补性的工作岗位,这既包括开发、维护新技术应用的高技能劳动者,还包括一些因自动化成本较高而难以替代的低技能劳动者,如餐饮服务、快递员等。第三次技术革命对就业的影响主要是在结构层面,导致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出现“两极化”趋势。

总体来看,前三次工业革命都对就业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概括出两条结论:一是技术革命提高生产率带来产出扩大,以及新技术创造的新商品和服务都会产生新的劳动需求,在长期中都增加了就业总量。二是技术革命对就业结构的影响更为深远。第一次和第二次技术革命通过促进经济发展进而产生了巨大就业需求,“技术性失业”只是前两次技术革命期间的“短期”负面影响。第三次技术革命使生产和服务的自动化程度大大提高,取代了重复性中等技能工作岗位。与技术进步形成互补的高技能劳动力需求迅速增加,同时低技能非重复性直接服务于人的劳动需求也在增加,导致了

劳动力市场上的两极化趋势。

第四次工业革命即本文探讨的新技术革命,它以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为代表,在替代体力工作(简单劳动)的同时,也增加了对智力工作(复杂劳动)的替代。新技术革命促使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应用更加广泛,呈现出更为显著的技能偏向特征,开始从替代体力劳动向替代脑力劳动扩展。新的劳动力需求要求劳动者更加具备长期学习能力、沟通交流能力、发明创造能力等不能被编码复制的非常规技能。2023 年初,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正为代表大语言模型在从专用智能迈向通用智能时代。一些原本属于复杂技术的职业和工作岗位正在被生成式人工智能所替代。如一些技术工作、媒体工作、法律工作和金融工作等,其中包括程序员、软件工程师、统计助理、翻译、文字创意工作者、媒体出版行业、税务审计、法律助理、贷款审批专员、个人理财顾问以及会计师等职业面临被生成式人工智能替代。而像农机操作员、安装维修工、社工、房屋清洁工、家政/保姆等职业没有受到冲击,这些职业需求的共同特点是需要与人的交流、情感互动、操作的非重复性以及应变能力,被新技术替代的难度和成本都很大。由新技术革命所推动的劳动力人口向服务业部门的转移而创造的新就业岗位,就可能小于由其颠覆性创新而替代的就业岗位,即其创造的新就业岗位的数量可能会小于被其所消除的就业岗位的数量。

(二)技术革命的飞速发展伴随着收入不平等的扩大

从发达国家整体或单个国家来看,技术革命飞速发展的同时,都出现了收入不平等的扩大。第一次工业革命到整个 19 世纪,英国和法国的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大体在 35%—40%,20 世纪中期下降到 20%—25%,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初再度回升至 25%—30%^[3]。第三次技术革命后全球劳动收入份额普遍下降,主要经济体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显著提高。1970—2010 年间,美国、德国、英国、加拿大、日本、法国、意大利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资本收入占比不断上涨,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4]。这一时期也是信息和通讯技术革命飞速发展的时期,第三产业日益成为发达国家的主导产业,就业结构“两极化”导致收入分配极化。

法国在 1945—1967 年间收入不平等急剧上升,收入前 10% 的人群比重从不到 30% 上升到 36%—37%,这一时期以原子能和计算机的发明应用为标志,是第三次技术革命的第一阶段^[4]。之

后,1968—1983年间收入前10%的人群比重回落到30%。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①,1983年后,法国收入不平等程度又开始不断提高,2000—2010年间前10%人群的收入比重再次上升到大约33%,这一时期正好是以信息和通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的飞速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收入前1%的人群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仅为7.1%,2010年约为9%。瑞典前1%人群的收入比重在20世纪80年代约4%—4.5%,1990年代后,金融自由化、高管薪酬市场化以及资本收益增长推动了占比的上升,2004年达到6%^[5],2010年后达到了7.1%。德国前1%人群收入占比从20世纪80年代的8%—9.1%提高到了2010年的11%^[6]。2000—2010年,意大利前1%人群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从7.2%增长至9.1%,西班牙前1%人群的收入占比从6.8%增长至8.9%^[7]。不仅如此,2000年以来,新技术革命使劳动者对经济增长的分享比例趋于下降,主要原因是随着工业机器人、数控机器等价格的不断下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进机器得到越来越多的使用,从而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严重冲击。

(三)技术革命导致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工资差距不断扩大

20世纪50年代,美国前10%人群的收入占比为25.4%,前1%人群的收入比重是5%—6%。但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前10%人群和前1%人群的收入比重开始上升。美国前10%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20世纪70年代的28%,到21世纪伊始超过了43%,前1%人群收入占比从6%升至15%,增速比平均收入增长明显高^[8]。20世纪70年代,英国、加拿大前1%人群的收入在国民收入所占比重约为9%、澳大利亚仅为5%,与美国接近。2010年美国前1%人群收入的比重则达到了20%^[9]。相比之下,2010年英国和加拿大分别为14%—15%,澳大利亚为9%—10%^[10]。美国前1%人群收入的比重增长大约是英国和加拿大的2倍、澳大利亚的3倍。美国收入不平等程度不断加深,主要是由工资收入差距的上升所致,尤其是处于工资层级顶端群体(如大公司的高管)超高薪水的出现。这是由于技术革命增加了对复杂劳动的需求,复杂劳动通常要求更高的技能、知识和专业背景,这就使从事复杂劳动的人相对于从事简单劳动的人,具备更高的市场价值。复杂的技术创造与简单工作操作之间的不对称,导致简单劳动者在要

素报酬分配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同时,技术革命引入了更大的市场竞争和全球化劳动力市场,更加剧了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之间的工资差距。

因此,如果技术革命替代的只是简单劳动,则有利于培养中间技术阶层,进而培育中产阶级。如果中等收入群体并未随着经济增长而壮大,比重反而呈现缩小趋势,将带来收入分配的恶化。新技术革命正在不断替代大量的中间技术劳动者,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就容易产生收入“两极化现象”,任其发展将会形成“金字塔型”的收入分配社会,而不是我们期望的“橄榄型”收入分配社会。

二、新技术革命对收入分配影响的理论分析

在经济学界,技术进步作为推动长期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已形成广泛共识,但其对就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的具体影响仍存在较大争议。古典经济学及其追随者普遍认为,尽管技术进步可能导致部分劳动者失业,市场机制可通过自身调节实现对就业结构的再平衡。然而,这种“自发补偿”机制的有效性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随着对技术进步有偏特性的理论研究深入,学者们开始深入探讨不同类型劳动者所受影响差异。在以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中,理论分析日益倾向于采用以工作任务为单位的细化分析方法,以更准确揭示技术变革对不同劳动内容和就业结构的差异化影响,本部分将系统梳理相关理论演进,并明确新技术革命对收入分配影响的作用机制。

(一)技术革命对收入分配影响的传统分析

在早期技术革命对收入分配影响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借鉴要素替代理论,将劳动力划分为高技能与低技能群体,分析不同要素偏向的技术进步如何通过改变要素需求变化,影响不同技能劳动者之间的就业结构与相对收入^[11]。由此发展出的传统模型将劳动力划分为不完全替代的高技能与低技能两类,将技术进步视为提升高技能劳动者生产效率的有偏变化,并在给定生产函数下推导出不同技能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及其比值。其结果表明,劳动力市场的工资结构由技术进步的偏向和不同技能劳动者的比例所共同决定,高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会显著增加高技能劳动者收入,并且拉大高低技能之间的收入差距,但社会的平均工资会最终增加,不论高技能劳动者和低技能劳动者都能获得比技

①法国、日本及瑞典的有关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不平等数据库:<https://wid.world/data/>。

术进步之前更高的真实收入水平,美国^[12]和其它国家^[13]在上世纪的发展事实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这一理论。

传统模型通过划分高低技能劳动者并引入简化的供需均衡机制,有效解释了 20 世纪技术进步引发的就业市场变动。但是,在当前新技术革命背景下,以机器人、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创新不再是简单的岗位替代,而呈现出比原来更强的技能偏向特征,传统模型的局限性便越来越突出,这尤其体现为以下三点:第一,传统模型将技能与工作岗位相对应,忽视了现实中多数工作包含多种任务和技能要求,例如教师不仅需具备专业知识,还需具备班级管理与沟通协调能力,难以简单归类为高或低技能职业。第二,传统模型将技术进步视为外生变量,未能考虑劳动供给结构变化对技术路径的内生影响,例如高技能劳动供给的增加本身可能促使技术向高技能偏移。第三,传统模型难以解释当前劳动力市场中的“极化”趋势,即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与高收入群体在整体收入中占比上升,而中等收入群体的占比持续下降。

(二) 新技术革命的工作任务分析框架

传统模型难以揭示技术变革在实际应用过程中通过哪些具体机制影响就业与收入,尤其在职业界限日益模糊、岗位内任务日益多样化的现实背景下,其限制越来越突出。为更全面认识新技术革命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学者们对技术替代的刻画不断细化,基于工作任务的分析框架(Task - 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 TBTC)^[14]成为当前研究新技术革命收入分配效应的主要理论路径。该理论不再将职业整体作为替代和补偿分析的对象,而是将生产过程拆解为一系列具体工作任务的集合。每个任务因其可编码程度、执行复杂性等特征表现出不同的自动化替代可能性,人类劳动者和新技术在执行不同任务上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由此构成相互替代或互补的关系。随着技术进步推进,新技术不断扩展其可承担的任务边界,进而改变劳动在各类任务之间的配置方式。

该理论将生产函数建构为一系列工作任务的集合,并依据常规和非常规、操作和认知两个维度将工作任务划分成不同类型^[15]。第一个维度是任务的不确定性程度,一类任务按照既定的设计方案和程序进行,标准化程度高,另一类则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需要即时处理和自主决策。第二个维度是任务的性质,工作要么主要依赖体力或操作技能,要么主要依赖认知处理。基于这两个维度,工

作任务大致可以分为四类:(1)常规体力任务,如工业生产等重复性体力劳动,易于被机器人等自动化替代;(2)非常规体力任务,如搬运或攀爬楼梯等非标准化操作,替代成本较高;(3)常规认知任务,包括规则化、步骤明确的认知工作,如流水线数据录入或基础会计处理,是目前人工智能技术最主要的潜在替代工作;(4)非常规认知任务,又可细分为分析类和交流类两种,前者涉及创造性问题解决、判断与决策等复杂思维活动,后者则依赖人际互动和沟通能力,均难以标准化的进行编程。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主要导致常规任务的自动化,使得从事这类任务的劳动者就业机会减少,而非常规任务因其较高的非程序化特性,在技术发展过程中得到扩张。

基于这一理论逻辑,新技术革命会对从事不同类型工作任务的劳动者就业收入产生差异影响,进而改变收入分配格局。具体来看,新技术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是替代效应,即在常规体力和认知任务中,技术相较于人类劳动者拥有更高的生产率,导致相应岗位被替代;另一方面是补偿效应,其作用机制主要包括四方面:第一,生产率效应——技术提升企业整体效率,促进产出扩张,进而带动劳动需求增长;第二,资本积累效应——技术进步促使资本成本下降,促进资本深化,并带动相关劳动岗位的创造;第三,自动化深化效应——通过用更高效的技术替代原有的自动化设备,提高整体生产率,间接刺激就业需求;第四,任务创造效应——技术的发展本身也催生对新型任务的需求,如人工智能背景下出现的数据标注师、算法训练师等新职业,这些新任务通常与高技能劳动者形成互补。

(三) 新技术革命对收入分配格局影响的研究

工作任务分析框架得到了一系列研究的验证,新技术革命对不同类型工作任务的替代与补偿作用具有选择性,新技术倾向于替代结构化程度高、可编码的常规任务。特别是在技能差异上,工作任务分析框架能够有效分析技术进步带来的工资极化现象,中等技能劳动者所承担的常规工作任务与新技术的替代性最强,其就业需求和工资水平持续下滑,而高技能劳动者由于更多参与非常规认知任务,不仅较难被替代,反而能从新技术的扩张中获得“技能溢价”或“任务溢价”^[14]。在一个考虑产业关联效应的均衡模型研究中,美国近 40 年来 50% 至 70% 的工资结构变化,可归因于新技术内从事常规任务劳动者相对工资的持续下降^[16]。随着新技术革命在中国的迅速发展,中国劳动力市场亦展现出越来越显著的工资极化现象^{[17][18]}。

新技术不仅通过改变技能结构影响劳动者间的收入差异,还在产业、区域与人口层面重塑了收入格局^[19]。在产业结构层面,新技术推动就业从农业和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20],而这一转变往往伴随着行业间工资水平的重新排序,加剧了不同行业劳动者间的收入差距。在区域结构层面,受技术扩散速度与产业集中差异影响,新技术在不同地区造成的收入冲击存在显著差异。部分研究发现美国机器人密集地区就业与收入受损显著^[21],但德国更强的补偿效应缓冲了这一冲击,地区总体就业与收入结构较为稳定^[22]。在人口结构方面,新技术可能进一步加剧城乡间的收入差距^[23],却可能缓解不同性别劳动者的收入差距^[24],新技术革命正推动收入格局的多层次重构。

综上所述,工作任务分析框架系统揭示了新技术革命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机制。新技术对不同类型任务的替代与补偿作用会导致就业结构极化与工资差异扩大,进而推动收入分配的再分化。这一机制不仅在技能维度上表现为中等技能劳动者的相对劣势,也在产业、区域及人口结构中呈现出多维度的分配差异。国内外大量研究已从不同层面验证了该理论逻辑,本文也将以此为基础,系统考察新技术革命对我国就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的影响,重点分析技术进步如何改变就业结构的工作任务需求变化、不同技能劳动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职业内部不同工作任务劳动者的收入差异,更全面的阐释新技术革命对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

三、新技术革命对我国就业结构和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

(一)我国就业结构整体变动与技术进步趋势保持一致

根据1990—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就业结构变动的整体趋势与技术革命、新技术应用基本保持一致。过去30多年,我国非常规工作任务岗位明显增加,1990年在总工作任务中的占比为38%,到2020年这一比重上升到57%;与此同时,常规工作任务占比则从1990年的62%,下降到2020年的43%^[25]。这与新技术革命减少重复性、可编程常规工作任务需求的国际经验和普遍现象是一致的。另一方面,认知型工作任务在历次人口普查中的比重也不断增加,这说明新技术革命不仅增加技术偏向型的工作任务需求,同时也增加了知

识偏向型的工作任务需求。1990—2020年人口普查反映出我国职业变动趋势与世界银行发布的工作性质与技能需求变化的国际经验相似^[25],新技术使非重复性认知技能和交流、社会行为技能的需求都呈现上升的趋势。

(二)新技术革命对我国就业和劳动配置的影响

首先,新技术革命快速推进的过程中,我国就业总量和每年新增就业数量仍然保持稳定。2012—2022年间,我国就业总量年均在7.5亿~7.6亿人之间,城镇新增就业数量每年保持在1200万以上^①。其次,新技术革命对我国就业需求结构产生了显著影响。根据我国制造业企业与员工匹配抽样调查数据,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新技术应用对我国制造业一线生产工人的就业需求产生明显的替代效应。使用工业机器人、智能化自动化机器的制造业企业,对一线生产工人的就业需求减少约21%;但同时,对中高层管理人员、技术研发人员、一般管理人员和办事人员的就业岗位需求分别增加了1%、5%和5.8%^[26]。新技术革命在替代普通工人的同时,增加了“人机互补”“人机协调”“人机交互”等新岗位需求。再次,新技术革命趋势下我国劳动力就业不断从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导致制造业就业下降,服务业就业份额增加。与此同时,劳动生产率提高面临挑战。2012—2022年间,我国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平均为27.1%、29.2%和43.7%,三次产业对GDP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5.2%、36.5%和49.3%^②。由此可见,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明显低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是工资收入持续增长的基础,对大量从第一、二产业转移到第三产业的普通劳动力来说,虽然可以通过数字经济平台获得多元化的就业机会,突破了传统的雇员工作和自雇创业的工作形式,但长期收入增长难以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整体上将对收入分配带来不利影响。

(三)新技术革命将拉大我国劳动收入的内部差距

新技术革命趋势下所涌现的新领域、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新服务等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岗位需求。这些新就业需求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技能偏向型需求增强,减少了常规工作任务和传统工作岗位需求,增加了非常规工作任务和知识密

①根据2012—2024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②根据2012—2024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集型岗位的需求,收入分配将进一步向具备新技术革命偏好的技能需求集中。高技能劳动力的技能溢价不断上升,低技能劳动力不管是在制造业还是在服务业,从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红利中所获得的份额都小于中高技能劳动力,并且低技能劳动力的收入份额占比下降更为迅速,可能导致我国劳动收入内部差距扩大。新技术革命产生的就业需求与劳动者技能之间的差距,以及不同劳动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是我国收入分配面临的挑战之一。根据我国制造业企业与员工匹配抽样调查数据结果,智能化机器人的应用会使研发人员、中高层管理人员的工资提高约 9%,其工资增长率是一线生产工人的 2 倍。与低技能工人相比,智能化机器人技术的应用能使高技能工人工资增加 6% 以上^[27]。总体上,新技术革命将为高技能劳动者(从事非常规工作任务)和替代成本较高的低技能劳动者带来较大的收入改善。对那些工作任务可以被人工智能替代的中等技能劳动者产生较大冲击,进而可能造成像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出现的就业和收入“两极化”现象。

(四)新技术革命可能重塑我国收入分配格局

一方面,新技术革命驱动的数字平台经济在我国发展迅速,平台经济催生了大量新型就业岗位,加上零工经济就业者的灵活就业,使普通劳动者多元化就业成为可能,这为许多低收入群体提供了更为广泛的获得劳动收入的途径。尤其是直播电商平台的兴起,为许多农民提供了在乡村获取收入的机会,推动农产品供应链的升级,提高了当地农户的收入,对改善收入分配具有正向作用。但另一方面,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经济增长成果不会自然而然地被全社会均等分享。以人工智能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打破了以往经济活动中受劳动力约束的投资报酬递减规律,可能会产生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增趋势。一是由于新技术革命有利于超大型企业的自然垄断发展。例如,大部分互联网平台细分行业经过激烈的市场竞争后,会形成一两家平台企业占主导的市场格局,从而出现利用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回报的现象。这类超大型企业具有资本高、劳动成本份额低的特点,随着这类企业在各个行业越来越突出,就会造成整体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趋于下降,会对社会福利造成损害。二是新技术革命对不同劳动者(从事常规与非常规工作任务)会产生不同的替代弹性,从事常规工作的劳动者面临被新技术替代风险,同时新工作替代旧工作也导致部分劳动者失业,新技术对劳动力产生的

“替代效应”趋向于使国民收入中劳动份额下降。

不仅如此,新技术革命推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客观上会增大行业、城乡、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在行业层面,2022 年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与软件在所有行业中平均工资最高,达到了 220 418 元,是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114029 元的 1.93 倍^①,新技术推动的相关行业高速发展在客观上会拉大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在城乡与地区差距层面,新技术应用具有较强的规模效应,大部分互联网数字平台及科技独角兽企业集中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少数城市,新技术应用集中的行业和产业空间分布整体上呈现“东强西弱、南强北弱”的不均衡分布特征,城乡之间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网普及差异也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上述这些都将会冲击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对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产生不利影响。

四、构建与新技术革命趋势相适应的就业和收入分配政策

充分就业是按劳分配最主要的实现途径,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把稳就业提高到战略高度,才能充分发挥就业收入分配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使最广大的普通劳动群体通过初次分配参与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一方面通过实施就业优先、稳就业不断提升劳动收入份额。21 世纪以来,一些原本中等收入群体占比较高的经济体,由于劳动力市场两极化、产业空心化、实体经济弱化导致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缩小,造成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既与劳动分工变化、技术进步对常规工作任务和职业的替代有关,也与产业政策和就业政策相互配合的缺位相联系。要保持中等收入群体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占据合理的比重,就需要不断扩大劳动份额。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国民收入中的劳动份额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对改善收入分配格局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扩大就业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必要条件,协调好劳动生产率提升和劳动收入增长的相关关系,为持续改善收入分配形势创造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避免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的发展模式,减少经济周期波动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冲击。随着我国人口转变进程的加速,劳动力资源的相对比较优势将会发生逆转,要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把就业优先、稳就业政策与现代化产业体系

①根据 2024 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不断巩固优势产业地位,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升地区的产业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实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与就业增长的统一。

(一) 要对收入分配的政策优先序进行调整

新技术革命具有典型的技能偏向特性,与新技术形成互补或在新技术应用中仍具备显著比较优势的高技能劳动者,服务于人们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但又不能被自动化的低技能劳动者,都能够从新技术革命中受益。而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中等技能工作的劳动者,收入水平将显著相对下降。因此,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居民与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在再分配调节中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劳动者在新技术冲击下能够获得收入提升、取得基本保障。新技术革命也对既有的分配制度也提出了新要求。当前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并没有考虑到新技术革命扩大不同技能劳动者收入差距的问题,通过政策优先序调整确保不同技能劳动者都能在新技术革命下获得收益改善,应成为收入分配制度调整的最重要内容。

(二) 充分发挥初次分配对不同劳动者带来的收入提升效应

充分发挥初次分配对不同劳动者带来的收入提升效应,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时不仅关注他们的收入数量,更要从收入增长的可持续性入手,确保中等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积累足以应对新技术革命的冲击。初次分配是劳动者收入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人力资本积累又是决定劳动者初次分配的核心要素,为劳动者培养起符合新技术需求的人力资本是应对挑战的最根本途径。从短期来看,需要通过培训等多种途径解决技术性失业者的技能提升与再就业问题。从长期来看,整个人力资本积累体系都需要做出更具前瞻性的改变,专业性导向的教育体系不能再仅仅局限于单一技能的掌握,更应该在发展劳动者的基本通用技能基础上,着重培养综合运用多种技能的能力。与教育体系相补充的其他技能培训体系也将在技术加速变革时代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从而使更多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可以获得与新技术相适应的均等化提升。

(三) 向低收入群体倾斜,发挥再分配调节的保障作用

更加注重社会发展和社会福利体系建设,进一步发挥再分配调节的保障作用,携手新技术革命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加强再分配调节对低收入群体的倾斜力度,防止劳动极化、收入差距过大等现象的发生。当前,不论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还

是不同群体之间的工资差距,近些年来都没有明显缩小。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仍处于较高水平,而占我国税收主体的间接税、不同群体间的社会保障费是累退性质的,在收入调节中还造成了扩大收入差距的逆向作用。因此,我国的再分配制度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就目前而言,再分配制度要加大对技术性失业者对支持力度,避免收入差距因新技术冲击而进一步扩大。同时建立起更为完善的税费制度来更好发挥其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就未来而言,政策制定要持续关注与技术进步有关的制度发展动态,提高现有的社会保障水平,探索劳动与资本、技术再平衡的社会保险制度,对未来科技发展成果的全面共享做出规划。

(四) 以革命性方案应对受冲击群体和社保体系的新挑战

新技术革命在其经济与社会后果方面具有史无前例的颠覆性,亟需以革命性的应对方案予以回应。新技术革命一个显著趋势是技术成本的降低,但却不能均等地渗透。新技术将不仅仅替代简单重复性劳动,也将替代大量脑力工作的复杂劳动。在此背景下,以“工薪税”为主要来源、与就业直接挂钩的社会保障体系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新技术所引发的结构性失业与收入差距扩大将导致需依赖救助的人口增加,而普通劳动者缴费能力下降,又将进一步压缩社会保险体系的筹资基础与支付能力。社会保险的筹资逻辑亟需从“以人为本”向“以资本为本”转变,探索对高收益资本征收社会性负担的可能路径。

另外,“无条件基本收入”(UBI)作为一种面向未来的社会安全网,也成为回应技术性失业的重要探索方向。尽管尚未广泛推行,UBI已被认为可在传统社会保险机制失灵的情况下,为大规模失业人群提供托底保障。该制度具有三项核心特征^[28]:第一,提供可满足日常生活所需的现金支付;第二,这种支付不因个人收入的提升而减少或取消;第三,覆盖对象是全体国民而非特定群体。相较现有社会保险体系,UBI将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收入保障机制,更有效地缓冲技术进步对就业市场的冲击。此外,由于其全民性质,UBI在保障基本生活的同时,也在实质上推动国民收入向低收入者的再分配,不仅比局部性福利政策更能缩小收入差距,也降低了筛选转移对象所需的行政与社会成本。

(五) 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应对新技术革命对收入分配冲击

化解新技术革命对收入分配格局的不利冲击,

劳动者更好受益于新技术的发展,需要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应对。对于置身于人工智能新技术革命浪潮中的劳动个体,应不断地更新和提升与新技术相适应的技能,尤其是注重培养个体非常规认知和交流互动技能,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通过不断的知识更新和技能提升适应新技术革命变化的需要。对于企业,应为员工提供更多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机会,帮助员工掌握当前和未来新技术变革所需要的技能,在企业内部形成良好的“技术—技能”的匹配关系,实现员工和企业的双赢。对于政府制定部门,应充分重视新技术革命可能引致的收入不平等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通过社会保障和再分配政策调节,建立长效机制,努力实现技术进步与收益分配、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动态平衡。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 人民日报, 2025-10-29.
- [2] Feldman G. D. German Economic History[J].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1986(2): 174-185.
- [3] Piketty T., Zucman G. Wealth and Inheritance in the Long Run[M]// Handbook of Income Distribution, Volume 2B. Elsevier B. V., 2015: 1303-1368.
- [4] Piketty T., Zucman G. Capital is Back: Wealth - Income Ratios in Rich Countries, 1700—2010[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4(3): 1255-1310.
- [5] Roine J., Waldenström D. The Evolution of Top Incomes in an Egalitarian Society: Sweden, 1903—2004[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8, 92: 366-387.
- [6] Albers T. N. H., Bartels C., Schularick M. Wealth and its Distribution in Germany, 1895—2018[R]. World Inequality Lab, Working Paper No. 2022/09, 2022.
- [7] 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18[R]. World Inequality Lab, 2017.
- [8] Piketty T., Zucman G.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13—1998[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3(1): 1-41.
- [9] Piketty T., Saez E., Zucman G. 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s: Methods and Estimates for the United States[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8(2): 553-609.
- [10] Piketty T.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59-289.
- [11] Tinbergen J. Substitution of Graduate by Other Labour[J]. Kyklos: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Social Sciences, 1974(2): 217-226.
- [12] Katz L. F., Murphy K. M. Changes in Relative Wages, 1963—1987: Supply and Demand Factors[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2(1): 35-78.
- [13] Card D., Lemieux T. Can Falling Supply Explain the Rising Return to College for Younger Men? A Cohort - Based Analysis[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1(2): 705-746.
- [14] Acemoglu D., Autor D. Skills, Tasks and Technologies: Implications for Employment and Earnings[M]//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Elsevier, 2011, 4B: 1043-1171.
- [15] Autor D. H., Levy F., Murnane R. J. The Skill Content of Recent Technological Change: An Empirical Exploration[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3(4): 1279-1333.
- [16] Acemoglu D., Restrepo P. Tasks, Automation, and the Rise in U. S. Wage Inequality[J]. Econometrica, 2022(5): 1973-2016.
- [17] 陈岑, 张彩云, 周云波. 信息技术、常规任务劳动力与工资极化[J]. 世界经济, 2023(1): 95-120.
- [18] 王永钦, 董雯. 人机之间: 机器人兴起对中国劳动者收入的影响[J]. 世界经济, 2023(7): 88-115.
- [19] Restrepo P. Automation: Theory, Evidence, and Outlook[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23.
- [20] Autor D. H., Dorn D. The Growth of Low - Skill Service Jobs and the Polarization of the US Labor Marke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3(5): 1553-1597.
- [21] Acemoglu D., Restrepo P. Robots and Jobs: Evidence from US Labor Market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20(6): 2188-2244.
- [22] Dauth W., Findeisen S., Suedekum J., et al. The Adjustment of Labor Markets to Robots[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21(6): 3104-3153.
- [23] 刘欢. 工业智能化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来自农业转移劳动力就业视角的解释[J]. 中国农村经济, 2020(5): 55-75.
- [24] 许健, 季康先, 刘晓亭, 等. 工业机器人应用、性别工资差距与共同富裕[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2(9): 134-156.
- [25] 屈小博. 机器人与人的竞争: 新技术革命给中国带来的变化及趋势[M]//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No. 20.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191-211.
- [26] 屈小博, 吕佳宁. 机器人、人工智能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效应及异质性分析[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2): 30-44.
- [27] 屈小博. 技术进步与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 以机器人应用为例[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3: 111-135.
- [28] Hoynes H., Rothstein J. Universal Basic Incom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dvanced Countries[J].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2019(1): 929-958.

[责任编辑: 王 俊 唐少奕]